

民进党与台湾社会运动的关系

季伊昕*

摘要: 民进党与台湾社会运动间关系具有共生交互、可合作与矛盾冲突属性。在岛内民主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两者间的关系经历了共生依附、密切合作、隔阂疏离以及再次联手等变化。选举挂帅则丧失运动性格,运动挂帅则欠缺务实适应,反映出民进党在运动与选举两条路线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的矛盾与纠结。

关键词: 台湾政治; 民进党; 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683(2017)02-0035-09

DOI: 10.13818/j.cnki.twyj.2017.02.005

引言

民进党与台湾社会运动间的关系,是认识与研究岛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角度。两者是岛内政治发展进程中共生交叠、相互依赖的重要角色。共同的政治对手、相似的社会基础以及斗争路线是民进党与社会运动间合作属性的基础,民进党掌权后向社运界释放一定参政空间无疑强化了双方的合作。然而,执政后的民进党却使社运界相当失望,双方关系因路线转变、贪腐、政治机遇等因素变得尴尬、矛盾乃至冷漠疏离。蔡英文任民进党党主席后,两者间关系出现新的特征与模式:民进党对社会运动的“再发现”暗藏政治算计,培植激进社运侧翼、操纵青年投入社运中以打击国民党并夺取政权,对未来岛内政治生态与发展埋下伏笔。

一、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的共生交互属性

首先,从历史脉络看,民进党的发展与社会运动的酝酿、兴起与巩固同时展开,皆与岛内民主转型进程密切相关。民进党脱胎于社会运动,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为民进党的成立营造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提供了成立政党的社会基础,培养充沛的政治人才,而民进党的投入也扩大了社会运动的规模与效应。蒋介石逝世后台湾社会追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渐强,先后发生了“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重要政治事件,民进党创始人物黄信介、康宁祥、许信良、吕秀莲、林义雄、张俊宏、姚文嘉、施明德、陈菊等为首的“党外人士”高度活跃,在上述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掀起了岛内反国民党威权统治、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浪潮。1980年代,蒋经国加速民主改革,先后作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等决定。80年代后期,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当局双重施压:一方面针对当局,组织街头运动迫使其释放被关押人员,并呼吁开放“党禁”;另一方面针对民众,运用街头演讲、成立后援会与动员民众游行抗争等方式,促使社会运动由孤军奋战向组织化与规模化升级。1986年9月28日,

*作者简介:季伊昕,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并宣布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众多在社会运动中起策划和领导作用的党外人士成为民进党建党初期的灵魂人物。

其次，从国际背景来看，民进党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与现代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失去合法地位相呼应。随着台湾经济腾飞与现代化发展，岛内民主化诉求不断上升，民众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民主意识增强，并伴随各类环保反核、原住民运动、农工运动等“自力救济式抗议”层出不穷，使“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普遍诉求。在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转变下，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中国“法统”地位在同时期从根本上失去基础，长期塑造的“反共”意识形态被冲击，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和强制认同“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失去了权威，留下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而民进党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本土化”乃至“台独”意识觅得机遇，得到公开、极大的提升，互相形成支援，以台湾“本省人”为抗争主体的社会运动形成高潮^[1]。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运动基本上是本省人要求对政治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政治运动，虽然有少数外省人参与其中，但很快被边缘化。社会运动与民进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本省人。民进党成立时，16位主要干部中，仅有费希平一人是外省籍^[2]。“台湾意识”、“本土化”可谓是民进党与社运共有的潜意识。另外，部分对时局敏感的政治人物意识到台湾的政治重心已不在国际，而将在“立法院”，故目标明确地投入岛内政治选举中^[3]。正式建党后，民进党遂成为岛内社会运动主力军。作为一个新生政党，手中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且对组织的掌控能力也较弱，点燃民众对现行政权的不满情绪显然最为便捷有效。民进党因而提出具有高度民粹色彩的政治纲领，在行动模式上采取基层动员与街头抗争等激进手段，渗透民间社会，刻意培植自身“本土化”、“平民化”的政党形象，频繁发动以“本土化”与“台湾化”乃至“台独”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夹杂民主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横扫台湾社会，埋下分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种子。

再者，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的共生交互属性还体现于两者在组织架构及人才上的相互依附。民进党脱胎于街头运动，两者为开拓更广阔政治空间联手，选举时也常常将社运团体作为组织“桩脚”，因而党内众多干部长期与学运、文化团体间维持紧密关系。民进党创党初期即在党内设立负责同各社会运动团体联系与合作的“社运部”（后更名为“社会发展部”）。另外，民进党内部派系林立并广泛深度介入到社会运动中，许多社运团体公开或半公开成为民进党的外围组织，与民进党保持密切联系。

民进党派系	社团组织名称
“新潮流系”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台湾农权会”、“妇女进步联盟”、“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台湾教授协会”、“外省人独立促进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开拓文教基金会”
“正义连线”	“福尔摩沙基金会”、“福尔摩沙联谊会”、“扶轮社”、“医界联盟”、“首都基金会”等
“福利国连线”	“新文化基金会”
“台独联盟”	“世界台湾人大会”、“现代学术基金会”、“台湾安保协会”、“共和国杂志社”、“台湾建国运动组织”
“主流联盟”	“公民投票委员会”、“全民电视”

资料来源：根据郑明德《一脉总相承——派系政治在民进党》（时英出版社与杨毅周《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九州出版社）二书整理

最后，社运团体与外围组织是民进党重要的干部与人才储备库，社运骨干也将其视为进入政界的关键渠道。再者，民进党内部派系中的“学运世代”直接源自于社会运动，在民进党内精英中所占比

例较高。“学运世代”是民进党内的特殊群体,指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学运,尤其是1990年参与“野百合学运”并在之后加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如前任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前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马永成、前高雄市代理市长陈其迈、前后任民进党中央副秘书长钟佳滨、颜万进,以及大批绿营“立委”如李昆泽、郑丽文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4],对民进党内部生态、执政理念与具体政策有较大影响。民进党与众多社运团体间维持较松散的联盟关系,随民进党不断收获新的政治机遇,尤其是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后急需大量专业政治人才,社运界便成为民进党主要而关键的人力资源库。

总体而言,民进党与社会运动在岛内政治活动中成为相互交叠、共生依赖的两个角色。民进党透过社会运动探测社会变动的风向,攻击政治对手的机会,并寻求社运界的支持;而社运界则借助民进党扩大运动的能量与效应,并仰赖政党制度化的支撑,可以说两者间存在较深的交互共生关系。

二、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的可合作属性

民进党在建党前后与执政初期,同社运界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具合作空间大、程度深且摩擦小等特点。

首先,两者都对当时台湾政治状况不满,渴望通过激进运动手段达到变革社会的目标。两者皆把国民党视为需打击的政治对手。而可合作属性不仅取决于两者的相似之处,也建立于两者并无重大利益冲突基础之上:民进党作为政党以执政为重要目标,而社运界不会与民进党争夺政权。双方根据现实需要互为枪支与弹药。当年环保运动主导者之一、前“环保署长”林俊义曾说“环保运动只是民进党执政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反体制”、“反独裁”,达到颠覆国民党统治。但鉴于两者可实现互惠互利,达成赔偿、迁厂、停工为主的环保运动目标,民进党长期与环保运动组织者、环保NGO组织结成了“战友”关系与情谊^[5]。社运界拥有民进党极度需要的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而民进党作为新生政党包袱与束缚较少,与国民党及旧体制对抗时冲击力与破坏力都较大。

其次,民进党与社会运动支持者的社会基础有较大重合。为与大资产阶级代言人国民党有所区隔,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时便宣称将其政治基础建筑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劳工、农民、弱势群体和其他长期受国民党压迫的各阶级身上^[6]。而社会运动主要由受害者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中产阶级组成。民进党成立初期的成员与支持者主要由包括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作者、普通职工等在内的劳工阶级与包括自营商、企业家在内的小资产阶级为主。随民进党实力与执政欲望皆上升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为消除中上阶层与大资产阶级对其可能上台执政所怀有的疑虑,民进党展开了系列拓展社会基础的转型动作,以争取中产阶级与大财团支持,并成功利用省籍矛盾与南北经济差距吸引本土意识较为强烈的中南部农民的支持^[7]。支持者社会基础重叠度高是双方合作的奠基石。

再者,民进党建党初期倡导的路线与社会运动相契合。民进党创始阶段以本土工农社会阶层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言人自居,针对国民党“金权合流”弊病提出一系列照顾中下阶层利益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借由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出道的民进党党内存在一种模糊的、源自台湾现代化初期左翼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如建党初期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与“福利国连线”等派系,反映出部分派系人士认同左翼思想^[8]。而这正与当时此起彼伏的包括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老兵返乡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抗争运动路线主题相吻合。

最后,民进党执政时期开启部分社会议题的决策参与管道。以往,国民党执政当局决策机制的特点是由上而下,社会运动团体,尤其是环保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民进党一方面缺少“中央执政”所需人才,另一方面对国民党所遗留下的统治机器存在不信任心态。如此环境下,环保运动者较易获得进

入体制的机会并从内部产生影响力。从人选与机制两方面入手，可更好理解民进党如何将社运力量纳入决策参与过程：（1）以“环保署长”人选为例，民进党执政当局任用了有“反核运动之父”之称的林俊义，此任命具特殊意义，代表环境运动朝体制内发展的巨大跨越。林虽任期不长（2000年5月-2001年3月），却是首位具民间运动声望的最高环境行政长官。另有三位分别有绿党、环保联盟、野鸟协会社运经历的人士担任“环保署长”机要秘书工作。通过他们居中协调，绿色团体与当局的沟通较以往更容易。更重要的是：社运界开始理解官员处境，而官员也开始信任他们以往认为激进具破坏力的社运团体。（2）以“环保署环评委员会”为例，这一新开启的参政机制被授予实质审查权，能够否决被认定有重大负面环境影响的开发案。2001年6月，“环保署”正式修改环评委员的提名任用办法。根据新规定，“环保署长”允许社会组织、专业团体与学术单位提出他们的建议人选，改变原先单方面遴选全部审查委员的模式。而提名资格方面尤其向社运界倾斜：民间环保团体的三年参与经历被视作获得认可的条件之一^[9]。总体而言，上述体制内的机制性改革证明社运团体获得官方的认同与接纳，官方对社运界也一定程度有所改观。

除环境运动外，女性运动也在1980年代兴起并谨慎介入政治体制内，新团体小心探索“解严”后新开启的空间。80年代末期妇女组织进一步转化，开始显露头角，获得民进党关注并引为合作对象。1988年，新妇女团体“进步妇盟”成立，公开支持当时甫成立不久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1990年，“妇女新知基金会”透过跨党派操作，将“男女工作平等法”送进“立法院”，获得国民党与民进党“立委”支持，这也是后来妇女团体特别注重修法工作的先声。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后，依照竞选承诺成立“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许多妇女组织参与其中，介入地方政府的妇女政策制定与执行^[10]。

三、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的矛盾排斥属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进党调整战略，由体制外街头抗争转向参与体制内选举，拉开了与社运界的距离。2000年民进党首次获取政权时，深孚社运界众望，但民进党上台作出一系列违背其在野时期主张的决策，使社运团体相当失望，两者间矛盾与相互排斥的属性显露得愈发明显，之前基础并不牢靠的策略性结盟出现裂缝。民进党与社运界的冷漠疏离乃至相互排斥有来自双方的原因。

（一）来自民进党方面的因素

第一，执政后，民进党改变原先定位，不再采取与社运结盟策略。民进党对自身定位从运动政党转型为议会政党，谢长廷直言“民进党在建党的第一阶段已经和革命团体做了划分，明确我们不是要革命；第二阶段，我们给民进党的定位为运动政党，在我们执政后的第三阶段，其实民进党就是一个议会政党。”民进党清楚认识到“我们就是要执政”^[11]。尽管社运协助民进党夺取执政，但在后者掌握政权后，社运团体因其自身抗争属性与具高度理想性的特质，成为“发泄不满”的反对力量，挑战民进党执政地位，给其制造麻烦。调整自身定位的民进党渐渐拉开与社运界距离，变得冷漠而疏离。

第二，将政党利益放在首位，官商勾结，牺牲社运界诉求。民进党执政后优先考虑政党利益，抛弃竞选期间对社运界许下的改革承诺，与大财团及资本力量紧密合作。陈水扁执政八年间与大企业联手，建立政商寻租联盟，不仅收买了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还大力推行有利于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公营事业民营化^[12]。2004年扁当局推动“二次金改”，背离强化金融机构体质进行整并的初衷，行拉拢财团、操控选举之实。政治上的出尔反尔与背信弃义使民进党逐渐失去社运团体与中小企业主的支持。另外，政党为获得最大选民支持与政治资源，不得不在政策上向中间靠拢，以争取人心以及最多的选票。但此举却忽略了社会分歧与异质性，而社会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正是具有边缘化、异质等特点。由

于政党趋同化,往往抢夺中间选民,放弃边缘选民以规避争议风险。执政与在野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此时更为突出。民进党执政后放弃原先先锋与激进立场,在社运议题上的保守化趋势备受社运界批评。

第三,民进党利用政治资源吸纳社运界人士进入体制内,却限制其发挥作用。民进党无法再代表社运团体利益,也不愿在体制内对社运界释放出更多立法、选举与执政空间,认为社运界要价过高无法合作而有意边缘化后者。反核与相关环境议题一直是台湾重大社会与政治问题。在野时期的民进党为在选举中争取反核团体选票支持,公开站在反核社团一边并参与反核活动,以至将“非核家园”主张纳入选举纲领中。2000年“大选”中,陈水扁为展现决心,甚至公开签署“反核同意书”承诺一旦当选便撤销“核四计划”。执政后,在反核团体强大压力下,民进党执政当局于2000年10月27日仓促宣布“停建核四”以兑现选举承诺。但立马遭致台工商团体与在野国民党的强烈反弹,“核四”机组主要供应方美国也高度关切此事。民进党腹背受压,在虚晃一枪给反核团体一个“交待”后于2001年2月14日宣布续建“核四”。这一举动激怒了相关社运界人士并宣布与民进党决裂^[13]。更多团体在静观了昔日战友四年执政表现,从希望到失望、从忍气吞声到割袍断义。社运界明确指出:民进党执政后推动许多对环境不友善的政策,痛批民进党执政当局四年以来的种种破坏环境生态的施政是“永续骗局”、“绿色政府架空绿色”、“扼杀母亲台湾”,认为这是传统偏离的环保团体,在被民进党以资源及位置收编后,经过四年的被出卖惨痛教训,终于在民进党再度执政后,对这个长期共同对抗权威的战友不再期待^[14]。同时认识到,环境团体必须摆脱昔日环境运动战友变成环境破坏凶手的失落之情,培育专业能力。然而,社运界又表现出对民进党无法彻底切割与欲拒还迎的摇摆心态。如在重要场合,社运团体仍需民进党政治明星为其“站台”,吸引社会关注并扩大影响。尽管多次在会议宣言及文件中痛陈民进党背叛,2004年起的每届全台“NGOs环境会议”开幕首日,主办单位仍邀请陈水扁莅临致辞,便展示了这一矛盾姿态^[15]。

(二) 社运界自身转变因素也在两者矛盾与排斥属性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社运界对民进党严重的贪腐问题非常失望,早期形成的理想化印象破灭。民进党在早期与国民党长期斗争中发展出“民主”与“清廉”的政治价值诉求,但上台后利用执政优势不断扩大政商关系的经营规模,构建起强固的利益共生结构,加速推进“黑金政治”步伐,弊案频出,对台湾社会观念与价值伦理造成很大冲击^[16]。陈水扁当局因其“失德、失政、失言和缺乏反省能力”,致使民进党的政治声望急剧下降^[17]。在2006年下半年,众多社运团体包括一些亲绿的社运界人士更是站出来发动和参与大规模的“反贪腐倒扁”运动^[18]。施明德聚集公民社会力量全面反制了由陈水扁挑起的“省籍——族群”政治斗争路线^[19],除泛蓝阵营外,许多具有独立色彩的知识分子纷纷出来以各种方式批判。“民主行动联盟”首先发起“倒扁联署”运动,紧接着各社团与社运界人士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将运动定调为“公正”与“民主价值”,使运动进入更有力量与实践意义的抗争阶段。

第二,社运界认清民进党政治投机主义,渴望摆脱政党的干预。环保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在野的民进党各派系人马积极介入,以谋求环保运动可能带来的政治资源和票源。民进党通过参与、主导等操纵环保运动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在受环境污染之害较深的中南部地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在县市长、“立委”的直选中赢得较多选票,不少县市逐渐由“蓝天”变“绿地”,由民进党执政并深耕。民进党获得社运界大力支持并最终在2000年夺取政权,后者对民进党兑现诺言深化改革台湾社会抱有很高期待,但最终认清现实。如台湾资深环境运动人士、学者何明修表示:“我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预测民进党上台之后的发展,未料想到废核改革的挫败、种种反制运动的兴起,乃至民进党政府的保守化。民进党的执政使得原有的政治联盟彻底断裂,在环境政策上的保守化是明显趋势^[20]。”社运团体代表人物公开或私下批评民进党背弃承诺,变相打压环保、劳工、性别等社会抗争运动,使

许多社运丧失其动员能量,运动进展受挫,许多议题处于“守势”阶段。2003年8月,原民进党“新潮流系”核心人物、“台湾促进和平文教基金会”执行者简锡堃鉴于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已经背弃对弱势人民的承诺,于是联合数十个原来支持民进党的社运团体,成立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泛紫联盟”,试图形成泛蓝、泛绿之外的第三势力。尽管此举并不成功,但彰显了社运界在政治上欲与民进党政权形成区隔,不再愿受后者操控摆布的政治态度与决心。

第三,社会运动自主性上升,对民进党依附性降低。台湾民主化进程对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影响加深,释放了较强的“社会力”,各类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兴起,不仅具有岛内支撑,同时开拓了部分海外联系与国际影响,故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对民进党依附性降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岛内相继成立台湾农民党、绿党、红党、客家党、第三社会党等以社会议题为导向的“第三势力”小党,尽管尚不可能对台湾政治生态形成较大影响,挑战蓝绿两极格局,但客观上保有一定的自身发展的空间与机遇。

四、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与社会运动间关系新趋势

过去八年民进党在野期间,民进党可以说是“重新发现”了社会运动这个“老战友”,重拾“社运路线”对台湾社会进行广泛动员,对国民党政权形成重大冲击。尽管蔡英文声称近年来台湾公民社会高度成熟,主导议题与组织动员能力强大,并“谦虚”表态“现在是公民社会要不要接纳民进党,而不是民进党能不能领导公民社会”,并表示“民进党只是社会运动参与者不再受邀上台发言”^[21],但民进党却多次收割社会运动成果,成为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且与先前的合作本质与模式已有很大不同。

首先,在野期间,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高度重视社运运动,重新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接任党主席不久的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定位和路线的改革措施。2009年2月民进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蔡英文宣示2009年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界的联系,重获社会支持^[22]。2012年岛内“大选”时,蔡英文更以“公平正义”作竞选主轴,此为台湾选举史上首次以这一概念为主导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真的就是民进党或蔡英文的核心价值与政治理念,更多反映出他们足够敏锐,体察到新的社会动向:台湾进入新的抗议年代,以“公平正义”口号为国民党政权贴上“亲商”标签,给两岸共享和平交流成果贴上“图利大财团”、“红色资本”标签,激起民愤,培植社会运动的土壤。

审视民进党如何与社运界合作,可以观察到两个特点,折射出民进党重新投向社会运动的真实目的。2014年5月,蔡英文在回锅民进党主席的交接仪式上,明确表示将基金会与公民团体的互动,作为重返执政的三大任务之一。即充分重视、利用公民团体的力量,分进合击,共同对付国民党,最终实现重新执政的目标。第一,民进党培植青年世代参与社运来推翻国民党政权,采取了多种具体做法。(1)制度化培养。蔡英文2012年卸任党主席后宣布成立“小英教育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实施青年政治工作实习计划,招募大学生进入立法机构办公室、非政府组织实习,透过参与实践,近身观察政治实务。蔡英文对下个世代的重视显然有其长远计划。将高达1.68亿元新台币的补助款及结余款全部注入,明确资金用途为结合在地公民团体,并“鼓动全民参与的社会力,让每个人都是改变社会的参与者”。2013年,民进党支援台湾大专院校开展政治工作实习计划,提供民进党议会党团服务处、议员服务处、其他“公民团体”暑假实习生每月近2万元新台币的薪资,让年青学子有机会成为政治工作者的实践以及实习的机会为诱饵为民进党直接招兵买马^[23]。(2)政治明星加持。而“小英教育基金会”首批公开活动即安排蔡英文与其他党内“大佬”以“讲师”身份,为民进党各派系的青年军讲课。其中包括,“扁

系”的“凯达格兰校青年营”、“新系”的“春雨台湾新青年领袖营”、“谢系”的“新文化工作队”。使学生能近距离接近民进党的“大佬”，用“领袖魅力”对青年施加影响。（3）政治前途利诱。除了诉诸理念外，民进党对青年们具现实诱惑，借1990年的“野百合运动”大批青年学生直接跻身政坛，其中不乏林佳龙、郭正亮与郑文灿般的民进党政治明星。对于部分具参政野心的青年而言，学运是步上政途的捷径^[24]。“反服贸”风波过后，蔡英文招募运动骨干陈子瑜担任社运部副主任。名噪一时的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人，正是“学运模式”的“模板产品”。（4）深耕校园与社区。这一策略使台湾高校沦为政治较量的场所，年轻学子成为政党、社团争夺的力量。一些民进党政治人物与学者明确提出，社运、民主、人权是可以利用且能吸引青年民众的王牌。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受到民进党诱惑的一批批年轻人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先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这种将抗争运动重心放在高校与青年上的好处在于核心决策者可以躲藏在运动之外，而又能实际收割运动的成果。而且利用青年学子开展运动的好处，还在于互联网并未改变政治规律，青年学子虽然可塑性强，但极易被煽动。

第二，民进党塑造社运流水线，批量制造多次社会运动。一条“生产线”制造了七场街头运动。事实上，自2012年“大选”败北，民进党明确提出进一步争取中间选民与青年世代的战略。自2012年起，蔡英文用心经营四年“青年战场”。间接为“反媒体垄断大游行”（2012年9月）、“洪仲丘凯道抗议”（2013年8月）、大埔“拆政府”抗议（2013年8月）、“反服贸”风波（2014年3月）、“反核四”运动（2014年4月）、“割阑尾”运动（2014年5月）、“反课纲”运动（2015年7月）等输出运动理念、口号、组织力量与参与者。这些社运事件中的带头人或抗争主力，基本都是深受民进党培训和引导的青年学生。

其次，民进党将社运重点从环保、劳工、性别等传统议题转移至“反权贵财团”与炒作大陆因素议题，煽动人心，以达到排挤传统社运团体，重新塑造话语权目的。2008年民进党下台以后，台湾社会运动再次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并且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泛绿阵营纷纷插手其中。以“反马”为明确目标的社会运动，多数都有政党推动的背景，借社运之名展开政治斗争。如2009年5月17日和2012年5月19日，由民进党发起并主导的“5·17呛马保台大游行”和“5·19呛马踹共大游行”^[25]，在台湾北高两市举行。2013年9月29日，台湾民间团体再次联合发起呛马大游行，迫使国民党“全代会”不得不延期。以反对两岸交流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最早的是2008年11月的反对第二次“陈江会”的“野草莓运动”。2014年6月25到28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也遭遇少部分社运团体的反对，期间还发生了“乌来铁链事件”、“高雄西子湾泼漆事件”等蓄意抗议冲突。另外还有一类把“反马”与“反中”结合起来的社会运动，如以“反服贸”为号召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反课纲运动”，带有鲜明的“反马反中反统”的政治色彩^[26]。

再者，民进党试图培植隶属于自己的社运激进侧翼。“反服贸”风波直接孕生的“时代力量”吸收大量激进社运干将加入，民进党亦在2016年台湾“大选”中倾力相助“时力党”，为其“辅选”助力。按照台湾政治板块结构与选举制度，分区选举如民进党不放出地盘，小党出头相当困难，而不分区政党票如无地方议会樁脚奠定基础，争取亦艰难。可见民进党不仅是“礼让”“时代力量”，更视之为侧翼辅佐培育。黄国昌为民进党点名礼遇候选人，苏贞昌等党内要人皆助力选举；在台北，谢长廷、游锡堃等纷纷为林昶佐站台拉票，蔡英文更是与之一同拍摄竞选文宣；在台中，林佳龙甚至担任洪慈庸竞选总部主委。表面上，“时代力量”的政治效应较强，政治主张与实际政策较为模糊，但通过本次竞选，已展露以下特质：（1）“台独”色彩浓重。“太阳花学运”突显了台湾社会“独”与“左”的两条路线：反中与反自由贸易两个极端诉求通过“反黑箱”的中性诉求链接。而“时代力量”即由此脱胎孕生的“独派”政党。选举中与“独派”政党整合结盟，在民进党向政治光谱中间靠拢之时，

代其巩固深绿地盘。胜选后当选“立委”与主席团成员拜会李登辉，向其“取经”，并获得其允诺支援“时代力量”智库与人才运作，助“时力党”拓展海外关系。（2）借民生议题销“台独”理念。紧贴岛内政治与民生热点议题，重新集结“独派建国”的社会力量。表面上在经济领域倡议打击“分配不正义”的社会福利主义政策，实质攻击国民党一切政策主张，选举后“时代力量”火力全开，在短期内已连续就“中嘉案”、“农损补助”、“原住民自然主权”、“松绑白领外劳门槛”等议题向当局发难，借机推行“台湾主体性”理念。（3）“修宪”与“追求国家地位正常化”为核心目标。“时代力量”从不掩藏其建党目的即追求台“国际地位正常化”，进“立院”后，便可能逐步将理念转化为“修宪”实际运作。并向执政党施压将“国家定位”与两岸关系问题说清楚，提出“解冻宪法”推动“由下而上”的“修宪改革”。

传统社运团体经过第一次政党轮替看清民进党与其合作的真面目，当前谨慎处理与民进党关系。“绿社盟”与“时代力量”同为第三势力，社民党同样脱胎于“太阳花社运”，同样采取结盟策略，但后者进“国会”，前者却前途堪忧，除却缺少政治明星，与绿社盟不认同民进党理念、不松口合作并与之保持距离有关。但大多团体因资源有限，不得不争取有限度合作。而国民党在历史上从未有与社运界合作倾向，心态上畏惧并排斥，社运界也不向其靠拢。故民进党全面执政后在操纵社会议题与社会运动上有较大空间与较少阻力。

五、民进党与社会运动未来关系展望

尽管民进党操弄民意、掌控社运打击国民党，并最终夺取政权看似成功，手段亦日趋成熟老练，但上台后，台湾外部环境与内部问题对执政党的挑战始终存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而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两岸关系在民进党上台后走向冷和。而台湾内部今后几年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发展空间压缩等问题接踵而至，台湾将进入“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时代，大学倒闭、经济动力匮乏等后果将会浮现。民进党在过去八年给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反对和抗议，但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蔡英文一再描绘的美好经济创新图景如空中楼阁虚幻不实。民进党面临新的政治周期，新的政经与社会问题，更加脆弱的社会心态与更上涨的民粹主义以及自身并不乐观的政治领导力，可谓挑战重重。

民进党与社会运动间的关系前景也可谓暗潮涌动。尚未执政的民进党已受到社运界诸多批评与抗议，如台湾社运界一年一度由劳工、教育、土地、性别界组织的“秋斗”大游行将终点设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对民进党在重大劳资争议（如关厂工人还款案）、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岸货贸、TPP）等重要社会经济议题上立场态度与国民党一致猛烈攻击^[27]。而妇女团体在民进党公布“内阁名单”中女性阁员仅占10%后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进行抗议。另外，“时代力量”是民进党一手培植的激进侧翼小党，但两党间对彼此的定位与政治算计不同，既能促成选举中成功配合，亦暗藏未来争拗乃至决裂的伏笔。在两岸政策与重大政经议题上对民进党是“加分侧翼”抑或“扣分负能量”尚未可知。在民进党再度执政的新的政治周期内，民进党与社会运动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有待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注释：

[1] 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 刘国深等著：《台湾政治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3] 康宁祥语，见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40年》，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13页。

- [4] 徐青：《民进党“学运世代”两岸政策主张的特点及其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3期。
- [5] 杜强：《台湾环保运动的范式、影响及其与政党关系研究》，《台湾研究》，2009年第4期。
- [6] 1986年《民主进步党党纲》。
- [7] 陈桂清：《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变迁与新特点》，《台湾研究》，2015年第5期。
- [8] 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 [9] 何明修：《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8页。
- [10] 庄雅仲：《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 [11] 《民主的包容，进步的取向——谢长廷先生访问记录》一文，选自《从建党到执政》陈仪深专访，台湾玉山社2103年。
- [12] 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 [13] 刘国深等著：《台湾政治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 [14] 苦劳网2004年5月14日发表题为《不只抛离民进党情结，环保团体再出发》。
- [15] 杜强：《台湾环保运动的范式、影响及其与政党关系研究》，《台湾研究》，2009年第4期。
- [16] 陈星：《民进党结构与行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 [17] 杨立宪：《民进党当局陷入执政困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19日，第3版。
- [18] 林劲、聂学林：《民进党基层经营初探》，《台湾研究》，2008年第3期。
- [19] 王茹：《台湾当前的政治危机与“省籍——族群——本土化”进程》，《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4期。
- [20] 何明修：《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序言。
- [21] 蔡英文：《英派》，台湾：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第92页。
- [22] 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 [23] 杨仁飞：《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异化”与“绿化”》，《现代台湾研究》，2014年第3期。
- [24] 刘强：《“绿色生产线”上的“芒刺青年”——民进党这样导演青年社运》，《团结报》2015年8月13日，第3版。
- [25] 按：“踹共”为闽南语，意为“出来讲清楚”。
- [26] 张文生：《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倾向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6期。
- [27] 《当街火烧蓝绿小猪，秋斗重申反右决心》，林佳禾报道，苦劳网：<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3994>。

（责任编辑 刘国奋）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PP And Taiwan Social Movements Ji Yixi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PP and Taiwan social movem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symbiotic interaction, cooperation as well as conflic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experienced symbiotic interdependence, close cooperation, alienation and further joint. The election approach makes the DPP lose the quality of social movement while the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lacks the realistic consideration. How to keep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is always a dilemma for the DPP.

Key Words: Taiwan Politics; the DPP; Social Movement